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姚雪垠專集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姚雪垠专集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前 言

(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参加协作编写的二十所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学、科研内部参考用书。

(二)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协作编写的单位有：山东大学、山东师院、广西师院、上海师大、上海戏剧学院、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大、华中师院、江苏师院、扬州师院、沈阳师院、河北师大、杭州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院、浙江师院、徐州师院、福建师大等二十所院校中文系。

(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拟分批编选作家作品研究专集。一九七九年计划编印的有：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包括郭沫若等近百位作家)；

马烽、巴金、王汶石、王愿坚、艾芜、田间、老舍、冰心、刘白羽、孙犁、沙汀、李季、李准、杜鹏程、陈残云、张天翼、周立波、周而复、杨沫、杨朔、玛拉沁夫、欧阳山、贺敬之、胡可、草明、柳青、闻捷、赵树理、姚雪垠、徐迟、秦牧、峻青、茹志鹃、夏衍、郭沫若、郭小川、郭风与何为、梁斌、曹禺、臧克家、魏巍等作家研究专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天安门诗抄》、《于无声处》、《丹心谱》、《甲午风云》、《江姐》、《刘三姐》、《红岩》、《红日》、《林则徐》、《林海雪原》、《杨开慧》、《阿诗玛》、新民歌、《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等作品研究专集。

(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各专集，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1)作家传略

(2)作家的生活与创作

(3)评介文章选辑

(4)作家著作目录、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五)茅盾同志为本书封面题辞，有关作家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许多同志给予热情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六)本专集由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编选。

(七)由于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错误缺点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四月

目 录

姚雪垠简介.....	(1)
------------	-------

· 姚雪垠谈创作 ·

创作漫谈 (1942)	(9)
需要批评! (1943)	(24)
小说结构原理 (1944)	(27)
《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写作过程及其他 (1947)	(38)
《长夜》后记 (1947)	(50)
打开窗户说亮话 (1957)	(55)
漫谈历史的经验 (1978)	(68)
关于典型问题的一封信 (1978)	(83)
一封谈创作规划的信 (1978)	(88)
向武汉的同志们致意 (1978)	(91)
给武汉师院中文系的一封信 (1978)	(95)
给故乡的文学青年 (1978)	(98)
上毛主席的信 (1975)	(103)
我的感激与决心 (1978)	(106)
姚雪垠先生谈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杜 渐	(118)
关于《忆向阳》诗集的意见.....	(132)

姚雪垠作品评介文章选辑

茅盾评述姚雪垠的《战地书简》	(140)
论姚雪垠的文学语言	李广田 (143)
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	胡绳 (147)
从《差半车麦秸》到《长夜》	王璠 (162)
关于《雪垠创作集》	刘以鬯 (165)
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茅盾 (171)
关于《李自成》的一封信	夏衍 (181)
读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秦牧 (183)
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二卷	
	冯天瑜 (192)
致姚雪垠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李国权 汪剑光 (214)
《李自成》讨论会简介	李悔吾 (219)
“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	
——访作家姚雪垠	徐民和 (231)
敬爱的周总理和作家姚雪垠	
——回忆与访问	倪鹤笙 (236)
春暖花开访姚雪垠同志	张友济 (240)

目 录 索 引

姚雪垠著作目录	(248)
姚雪垠作品评介文章目录	(254)

姚雪垠简介

姚雪垠同志，原名姚冠三，字汉英，一九一〇年出生于河南邓县一个叫姚营的村子里。少年时代，因家庭生活困难，长期失学，只读过三年小学和不到一学期初中。一九二九年从家乡去省会开封，考入河南大学预科。次年，因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斗争及学潮被捕，不久出狱，又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被学校开除。得知重将被捕，逃往北平，从此开始投稿生活。从青年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深感兴趣，并刻苦自学祖国历史和古典文学，为此后的文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三七年八月北京沦陷后，姚雪垠同志由北平回到开封。在中共地下省委领导下，与王澜西、范文澜、稽文甫等同志创办《风雨》周刊。一九三八年冬，在鄂北襄樊参加由钱俊瑞、曹荻秋等同志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与一部分同志在湖北均县举办抗战文化工作讲习班。一九四一年一度在大别山主编文艺刊物《中原文化》。一九四二年冬到重庆，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并担任创作研究部副部长。一九四五年去四川三台，任东北大学副教授。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任大夏大学副教务长、代理文学院院长。

抗战前在北平的时候，姚雪垠就开始了文艺创作活动，写了一些小说、散文发表在北京、上海的文学刊物上。他的成名

作是一九三八年初写成的短篇《差半车麦秸》。在这篇小说中，他运用新鲜生动的群众语言，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农民抗日游击队员的典型。作品最初投寄给武汉一家文艺刊物，竟被认为写得“噜嗦”而退了回来。后来转投给茅盾同志主编的《文艺阵地》（在香港出版），很快就被发表。当时，正是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充斥文坛之际，《差半车麦秸》的出现，使读者耳目一新，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公认这是第一批抗战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后来，这篇小说被译成几种文字，在国外也获得了好评。

此后，作者以较多的时间致力于中、长篇小说的创作。从一九四二年至四七年，相继出版了《牛全德与红萝卜》、《新苗》、《重逢》、《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一名《金千里》）、《长夜》等。《牛全德与红萝卜》是一部反映抗战初期游击队生活的长篇，作者着重刻划了两个出身、性格迥然不同的游击队员的形象。故事情节和背景描写比《差半车麦秸》复杂、广阔，但在思想深度和人物塑造方面，似乎没有新的突破。《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等作品，是反映国统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的。作者企图通过革命（抗战）与爱情的矛盾，反映这些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苦闷、彷徨与追求。但由于作者立场的局限，这些作品的成就不大，没有给读者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在这些长篇中，写得最好的一部，是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出版的带有自传体色彩的《长夜》（作者计划写的反映旧中国农村生活发生巨变的三部曲之一，另两种《黄昏》、《黎明》后均未写成）。这大概是中国第一部真实深刻地描写农村“土匪”生活的现代长篇小说。由于少年时代的特殊经历，作家对当时豫西一带多如牛毛的“杆子”生活和“绿林”人物很熟悉，因而这部充满乡土气息和传奇色彩的作品写得非

常生动感人，为旧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和自发斗争，留下了史诗般的形象描绘。然而，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今天，即使仅仅是为了了解姚雪垠的创作道路，研究他为什么能写出象《李自成》这样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巨著，认真读一读他早年的作品《长夜》，恐怕也是很有必要的。

姚雪垠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不断跃进，是与他写作态度的严肃认真和丰富的知识是分不开的。他的作品数量不多。每写一部作品，构思的时间较长，写作时态度严谨。他很重视读者对自己作品的反映。当一部作品酝酿成熟，在下笔前后，他常常找一些朋友聊天，听他讲述作品的故事情节。他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讲起来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他一面讲，一面注意听众的表情，然后研究听众的意见，进一步完善其作品的构思。他认为一个作家的作品，必须对读者负责。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很早就注意到姚雪垠的这种写作态度。一九四三年二月，姚雪垠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需要批评》的文学短论，认为作家的作品一经问世，就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因此作家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作品，虚心听取读者和批评家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同志看到这篇短文后，曾指示正在开展整风学习的新华日报编辑部同志，认真阅读这篇文章。以后见到姚雪垠同志的时候，又当面予以鼓励支持。总理的关心和鼓励，使姚雪垠同志永远铭感在心。他决心遵循总理的教诲，永远讲真话，做党的“诤友”。

全国解放后，姚雪垠为了从事创作，离开了教育岗位，一九五一年秋从上海回到故乡河南，一九五三年又到了武汉。在此期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入工厂农村，在努力改造思想的同时，

写出了一些配合当前政治任务的文字。一九五七年春，他应出版社之邀，赴京改稿。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姚雪垠的许多重要创作计划均成泡影。

五七年春天，领导上动员各界人士帮助党整风。雪垠同志出于对党的信任、爱护和作家的责任感，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打开窗户说亮话》，加上五六年发表了一篇《打破清规戒律》的短文，五七年一月份在《新观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惠泉吃茶记》（已选入《三十年中国散文选》），以及五七年在一次座谈会上作了直抒己见的发言，对某些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逆耳忠言”竟导致他被错划为“极右分子”，横遭批判斗争，并一度送往农村“监督劳动”——一直到二十二年之后，即一九七九年，沉冤才得以大白。有关部门现已郑重宣布予以改正。

这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对于一个年近半百的作家来说，其后果之严重是可以想见的。一个从青年时代就愿意跟着党走，怀着较高追求，以创作为终身事业的人，忽然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被剥夺了从事写作的权利，还有比这更令人痛苦难堪的事么？姚雪垠在武汉作协被批判期间，常常以泪洗面，夜不能寐。怎么办？从此搁笔不写，在沉默中了此残生？不能。这不是作家姚雪垠的性格。在闭门“思过”的日子里，司马迁以刑余之身发愤著述《史记》一类的事迹，常常在他的脑际浮现。古人能够做到的，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做到？于是，一个深埋心中多年的、宏伟的创作计划，决定付诸实践了。这就是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姚雪垠就有写作《李自成》的念头，并开始为此搜集、研究明末史料。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当他执

笔展纸、动手写作这部历史小说的时候，竟和他书中的主人公李自成在潼关南原大战中几乎全军覆没一样，自己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中也遭到了如此严重的挫折。但他也和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不被“失败”所吓倒，决心在挫折面前站起来。他暗暗地下定决心，即使生前不能出版，也要坚持将这部大书写成，让后人将稿子献给党和人民。一九五七年，在不断批斗中开始写《李自成》第一卷。为了“掩人耳目”，常常用一份写不完的“检讨”、“交代”遮盖着正在奋笔疾书的一叠叠原稿。挫折没有改变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心，没有毁伤他的创作激情，在被“孤立”的状态下无法借资料也没有难倒他。经过大约十个月时间，不但第一卷初稿写成了，还将第二卷写了部分。

一九六〇年秋天，姚雪垠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回到武汉，开始有机会整理初稿。获得热心同志们支持，他的《李自成》第一卷得以于一九六三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小说问世后，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一方面，读者热烈欢迎，争相购阅；另一方面，评论界却毫无反响，仿佛中国文坛上压根儿就没有姚雪垠这个作家，也不曾出现过《李自成》这部作品（据说上边有指示，他是“摘帽右派”，对他的《李自成》不要评介）。更加不正常的是，一九六四年作者发表了历史小说《草堂春秋》（作者原拟写作的《杜甫传》的一部分），作品一出现，立即遭到又一次劈头盖脑的“批判”。当然，谁都知道，造成这些不正常现象的根子，并不在评论界。然而冷遇也好，打击也罢，都没有使作家气馁。他不声不响，继续埋头赶写《李自成》第二卷。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正直的作家和一切优秀的作品，都受到了严酷的考验。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自

然也不会例外。不仅为写作《李自成》而多年搜集的图书、资料、卡片（用蝇头小楷写成，达两万多张）有随时被抄走、烧毁的危险，就连作家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就在面临人亡书毁的紧要关头，意外的遭遇挽救了他。原来，早在《李自成》第一卷出版的时候，姚雪垠曾寄呈一部给毛主席审阅。以后，没有得到消息。作者以为毛主席国事繁忙，可能没有看到此书。他没有料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在八月中旬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对当时任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同志说，《李自成》第一卷看过了，写得不错，你要通知武汉市委，对姚雪垠予以保护，使他将全书写成。王任重同志不顾当时窃据文革要职的戚本禹的阻挠反对，立即将主席的这一指示传达给武汉市委。市委迅即采取了有力措施。就这样，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第二卷原稿、藏书、卡片、笔记等得到了保护，避免了一场浩劫。

可是，严酷的考验和折磨远未到此结束。武汉地区的武斗一天天升级，使人得不到起码的安宁。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深入各个角落，使人噤若寒蝉，万马齐喑。在一次座谈会上，姚雪垠因有人拚命鼓吹“三突出”，歌颂江青的文艺谬论，忍耐不住，在大会发言，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原则，批评了过份吹捧“三突出”的荒诞论调，几乎招致一场无情的批斗。批斗他要呈请省委批准，被一位理解他的领导压下去了。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当时武汉市文化局创作室的负责人又故意给他各种毫无必要的工作，占去他的时间，使他不仅不能进行《李自成》第三卷的写作，就连第二卷的修改也无法进行。姚雪垠万般无奈，想到只有毛主席或者可以再次帮助他。一九七五年十月中旬，姚雪垠写信给毛主

席，陈述面临的困难，请求给予支持。信由邓副总理转呈。毛主席迅予批示，嘱有关部门给作者提供条件，将书写完。这样，雪垠同志由武汉迁居北京，写作条件略有改善。然而，“四人帮”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使《李自成》第二卷的修改和出版，仍时时受到干扰。姚雪垠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抱定“宁肯书不能出版也决不妥协”的态度，顶住了“四人帮”在文学和史学领域煽起的妖风迷雾。

粉碎“四人帮”后，姚雪垠也和文艺界其他长期受压的老作家一样，“漫卷诗书喜欲狂”，重新焕发了艺术的青春。一九七七年《李自成》第二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随后不久，修订后的第一卷也重新和读者见面。近年来，第三卷的若干章节，陆续在刊物上发表。社会上一度出现了《李自成》热：读者争购《李自成》，人们谈论《李自成》，舞台上根据小说改编的剧本，把小说搬上银幕的工作也正在积极进行。一时间，报刊上出现了大量评论，显示了文艺界对这部创作的高度重视。就大多数读者和评论家的意见看来，尽管在一、二卷中还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之处，有待作者在全书完成后作统一修改，但就总体来说，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成就，这部小说都将是一部可以和中外文学名著相媲美的传世之作。

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创作生活时，姚雪垠同志总是满怀深情地说：是党给了他艺术的新生命。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当时中央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受邓副主席委托，曾亲自登门拜访，转达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老作家的亲切关怀。有关部门专给雪垠同志配备了助手，为他提供了较好的写作环境和必要的图书资料，并为他考察历史地理进行的创作旅行提供方便。一九七八年，姚雪垠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主席。今年五月，参加

了以周扬同志为首的文化代表团去日本访问。

虽然年近古稀，而创作任务又十分繁重，但雪垠同志总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从事必要的社会政治活动。他知道，不关心、不了解现实的斗争，也写不好古代的斗争。因此，在埋头历史小说创作的同时，决不能割断与现实斗争的联系。近年来，他以自己一贯的坦率与直言，发表了一些引起广泛注意的文艺短论和文艺批评。为了祖国的科学与民主，大声疾呼，秉笔直书，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深思的重大问题。这种关心国事、解放思想、敢想敢说的精神，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曾因直言而蒙受过沉重打击的老人来说，尤其是难能可贵的。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姚雪垠同志计划在将来完成《李自成》第五卷之后，再争取用余年完成另两部长篇历史小说：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天京悲剧》和反映辛亥革命的《大江流日夜》。为了完成这样浩繁的创作任务，须发如银的雪垠同志决心与衰老作斗争，坚持锻炼身体，寸阴必争，一如既往，不论酷暑严寒，不论社会活动多么频繁，每天凌晨三时必起床工作，创作不辍。热爱《李自成》的读者，都衷心祝愿作者健康长寿，能够早日完成《李自成》这部鸿篇巨制，能为祖国长篇历史小说的画廊增添更多纪念碑式的作品！

一九七九年八月

姚雪垠谈创作

创作漫谈

姚雪垠

为着谈得亲切起见，请原谅我引用自己的创作经验。

一

一九三九年冬天，我从河口出发，往前线去搜集宣传材料。到枣阳后，某总司令派他的秘书钟君陪我到各师防地，负责招待和协助工作。钟君刚刚同一位女护士恋爱成功，很爱谈他的恋爱故事，正如一位将军爱谈他所不能忘怀的作战故事。我告诉钟君说要把他的恋爱经过写一篇小说，他非常高兴，费了两个晚上的工夫把故事的轮廓写给我，又把他的未婚妻找来同我见了一面。她是一位见人有点儿腼腆的姑娘，很朴素稳重，缺乏一般作政治工作的女同志们的胆大和活泼。从恋爱成功以后，她就离开了教会医院，来前方任军医院的中尉司药。钟君十分爱她，每次对我谈起来他们的恋爱经过，就会忍不住兴奋起来。

我自己对别人的恋爱故事往往是不感兴趣，但钟君的故事我还爱听，大概是因为这故事还带有新鲜趣味。我也爱谈自己的半真半假的恋爱故事，我谈故事时着重在细微的心理分析，

所以虽然所谈的都是些极其平凡的小故事或甚至不算故事，也常能在我周围的青年听众间引起来很大兴趣。可惜钟君不是写小说的，不懂得心理分析，这使我感到遗憾。自从我离开鄂北前线，一直不曾给钟君写过一次信，为的是我知道我的小说写成后一定使钟君失望。钟君希望我根据他所写给我的真实材料写小说，而我却在听他谈的时候就决心将他的故事改造，完全的改造。如今距我同钟君分手的时候已有两年多，我对于这个恋爱故事才改造完成，其中的情节已经跟原来的完全不同，金千里也决不是某总司令的秘书钟君，张蕙风也和钟君的未婚妻（现在大概已经结婚了）里外两样，假若将来有人从大后方将我这本小说寄给钟君，他一定只把它当做一本小说看，而不会承认是他某一个时期的生活纪实。也许他的夫人读了我这本小说后会骂我“缺德”，因为在他们两人看来，我确是故意的“歪曲事实”。

不过，如果她真是看了我的小说以后脸皮红红地骂我一声“缺德”，我的朋友钟君一定会替我解释说：“写小说的尽都是顺笔胡扯，管他呢！”

好象自从《西游记》出世以后，读书人便没人肯相信小说中所写的故事。但后来新文学成长起来，“现实主义”这一个名词就渐渐为大家熟悉。每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如今都知道应该忠实于现实，忠实于生活。我故意歪曲了事实，不是不忠实于现实么？在这里就牵连到“真实”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问题虽然不是多么难以理解的问题，但一般青年习作者却往往弄不明白，给“真实”做了忠实的奴隶，而不能俯瞰“真实”，将真实的事物予以分析、研究、概括和综合。

我常常接到青年习作者的小说稿子，夹在稿子中的信上常写着这样的话：“这篇小说所写的是实在的事情。”大体说

来，我认为这是很好的现象，因为这证明作者确是想表现他曾经接触过的，看见过的，至少是听见过的现实题材。但是他们不明白“现实”并不是“真实”；实在说，“真实”可以反映“现实”，而“现实”在内容上比“真实”更为丰富和深刻。所谓真实的人物，实际上只是指一个“特殊的”人物；所谓真实的事体，也只是指一个“特殊的”事体。至于现实的人物，则是许多真实人物的概括和综合；现实的事体也是许多真实事体的概括和综合。“真实的”意味着特殊性，个别性，而“现实的”却意味着一般性。现实主义者并不是反对写真实的人物和事体，而是将真实的人物和事体加以改造，使能代表一般的人物和事体，也就是求其典型化。“现实主义除开详细情节的真实性以外，”有一位西洋的哲学家说道，“还要表现典型的环境中的典型的性格。”同时这位哲学家很推崇巴尔扎克，贬抑左拉。左拉是自然主义的代表，自然主义的主要缺点就在它太忠实于琐碎事实。

高尔基是现实主义的巨匠，他从来不曾教训人死板板的忠实于“真实”。在《劳动与文化》一篇文章里，他叫人把“真实”加以夸张道：“艺术的目的是将好的事物加以夸张，使其越发的尽善尽美；也将坏的事物加以夸张，使其越发的显得卑鄙龌龊，使得人们觉得其对人类有害，唤起人们厌恶之感，唤起人们将人类生活中由于肮脏可怜的庸俗主义所产生的可耻可恶的部分加以毁灭的精神。”在同一篇文章里，高尔基又重述一位无名的老雕刻家的话说：“有些人物一定要雕刻得比真实的人物更为丑恶，又有一些人物一定要雕刻得比真实的人物更加优美。优美的，我将他表现得更为优美；我不喜欢的，我也不怕故意歪曲，不管将他刻划得如何丑恶。”高尔基并不叫我们忠实于一个真实的人物，而是叫我们忠实于许许多多的人。他